

# 香港師奶： 刻板印象和身份認同的研究

溫凱婷<sup>1</sup>

## 摘要

香港的師奶是一個文化產物。師奶在不同年代中隨著當代人的詮釋而出現不同的象徵意義。早於五、六十年代，師奶是一個對於平常婦女的稱呼，語意屬中性。從八十年代開始，師奶的意義傾向負面化。時至今日，社會個體對師奶的含意各有詮釋，有褒有貶。本文探討師奶含意被貶的原因，尤其重點分析人們對師奶的主觀詮釋。本文發現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受訪女性大多以比較負面的詞語來形容師奶，但認同自己是師奶的受訪女性卻會以較正面或中性的詞語來形容師奶。這情況反映了師奶的意義在香港文化中存有一個可協商的空間。在這個協商空間中，女性同時進行排他和尋求納入，以建構其身份認同，詮釋不一的師奶定義隨之出現。

---

<sup>1</sup> Wan Hoi Ting is a graduate of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 can be reached at her e-mail, heidiwan@ymail.com

## 前言

師奶所包含的意義實在好多，也很複雜。它是一種身份，但作為一種稱呼又包含著一些象徵意義，而當中的象徵意義似乎只有在同一文化下的人才能解讀。在不同年代中隨著當代人的詮釋又會出現不同的象徵意義。從人類學的角度而言，師奶是一個文化產物。

在討論香港師奶前，我想先定義本文所指的師奶是什麼。經過與數位已婚女性的訪談和個人的觀察後，我發現要定義師奶不是一件容易事。雖然有些受訪者會認為婚姻狀態就是一個定義師奶的客觀指標，但事實上，並非所有已婚女性都會被認為或認同自己是師奶。

然而，受訪者們都認同現在香港社會上說的師奶有一個共通點：師奶都是全職家庭主婦；她們都把大部份時間花在家庭事務上。但受訪者們也認為有全職工作的已婚女性也不代表她不是師奶。這種定義的矛盾正反映了受訪者們在定義師奶時雖然會受一些客觀條件影響，但她們的主觀詮釋也同樣重要。我沒有試圖說所有香港的全職家庭主婦都是師奶，但由於師奶的定義富有彈性，我只好透過受訪者的答案來把這個定義簡化，讓讀者更容易理解。

根據冼韻姬對師奶起源的研究，早於五、六十年代，師奶只是一個對於平常婦女的稱呼，語意屬中性。從八十年代開始，師奶才成為一個隱含負面意義的稱謂(冼2004)。這反映了師奶是一個轉變中的概念，當中的含意如何改變就是我研究的一大方向。

有不少的學術文獻都把師奶的意義傾向負面化歸咎於香港經濟轉型和教育普及等客觀原因。何式凝(2009)一份有關香港師奶的研究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何把香港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數目增加和女強人(經濟獨立女性)的出現，歸入師奶出現新意義的原因。何認為在香港人著重賺錢能力的價值觀下，女強人令師奶被邊緣化，被視為男性的經濟負擔，師奶從前的風光因而不再(何2009)。我認為這些客觀原因只是師奶的身份產生的基礎，絕不能只看客觀條件而忽略香港人對師奶的主觀詮釋。這就是本研究的第一個要點：強調師奶含義之改變包括了客觀條件和人們的主觀詮釋。

在訪問的過程中，和刻板印象不同，我發現女性的年齡、婚姻狀況和就業與否並不足以決定她是否是師奶。女性的外型、行為舉止、職業性質和教育水平都會影響到她們會否被視作為師奶。更有趣的是，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在定義師奶時大多會用一些比較負面的詞語如不修邊幅、厚面皮、斤斤計較來形容師奶。但認同自己是師奶的女性卻會以不太注重打扮、精打細算等較正面或中性的詞來形容師奶。這反映了在客觀條件(香港經濟轉型和教育普及)的影響下，人們會透過參與詮釋，為師奶建構各種不同的含意。而這些不同的詮釋又反映了師奶新含義的出現其實包含了一個協商的過程。

這些協商的過程非常重要。它們不單顯示出社會以及女性自身對婦女角色的要求，同時也驗證了在身份建構過程中，建構他者具有某種普遍性。探討在師奶負面化的過程中，已婚女性如何建構「我者」和「他者」是本研究的第二個要點。

### 研究背景

「師奶」一詞廣為香港人熟悉。在日常生活，甚至在報紙、雜誌、電視廣播內都不難發現師奶的踪影。表格一顯示了從2000年至2010年間內文中有師奶一詞的香

港報紙的數目。從中可看到提及師奶的報導或文章逐年增長，而二零零六年到二零零七年的增長尤其顯著。這些數字反映了師奶一詞在香港社會中的流行程度和廣泛性。

表格一：

從 2000 年至 2010 年 香港報紙內文中有師奶一詞的篇章數目			
年份	數目	年份	數目
2000	1179	2006	2652
2001	1861	2007	3953
2002	1560	2008	4071
2003	1611	2009	2636
2004	2153	2010	2911
2005	2421		

資料最後更新日期：31/12/2010

(資料來源：Wise News 電子報)

在電視廣播方面，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始於香港播映的日本動畫《我們這一家》，當中台灣譯名為花媽的主角被香港無綫電視台譯作花師奶。這舉動暗示了電視台認為花「師奶」比花媽更為符合香港人的文化，而這個名字亦更為傳神。二零零七年五月開始，《師奶兵團》在無綫電視播放。到了二零零八年，《師奶股神》亦隨之推出。這些以師奶掛帥的卡通影片、劇集和節目都證明了師奶在香港的社會有一定的含義或扮演一定的角色。

師奶一詞經常被用到，但到底有何含義呢？我曾在一間快餐店內目睹一名男士想跟一個帶著女兒的中年陌生女人說話。他大叫：「師奶！」但隨即卻不好意思地改口高呼一句：「靚女！」由此看來，稱呼別人為師奶是一件不禮貌的事情。師奶一詞似乎在社會交流上是一種忌諱。人們都因為要尊重別人，而只敢在背後稱呼別人為師奶。

我就是在那種背景下做研究：師奶一詞得到香港社會大眾的廣泛使用，但含負面意義。

## 研究目的與問題

透過解釋師奶身份建構的過程，我希望讓社會大眾更了解社會文化對自己的影響。在研究這個題目前，我對師奶亦有一些個人看法，甚至可謂成見。我想知道自己為何會對師奶有這些成見，為何師奶在香港社會中會處於次等的位置。為什麼師奶總是讓人覺得她們很無知或是很俗，比不上社會中的職業女性或是上流太太呢？我想知道師奶被負面化除了跟教育和職業有關係外，一些主觀詮釋在香港師奶的情況中又起了什麼作用。最後，我想知道認同自己是師奶的人在師奶被負面化的情況下作何感想。為何當中有些人會欣然接受這個很大程度上含負面意義的身份呢？

為了達到以上目的，本研究將會問三個主要的問題：(1.) 客觀環境改變和人們主觀的詮釋如何引致師奶的負面化？(2.) 已婚女性如何參與師奶負面化的過程？他們的目的又是什麼？(3.) 認同自己為師奶的人又如何應對師奶負面化？

## 研究方法

我的研究方法有五個：第一，向研究對象進行半結構方式的訪問；第二，觀察受訪者；第三，參考學術研究的文獻；第四，分析大眾傳媒有關師奶的報導或電視節目；第五，利用政府統計處的統計數據。

本研究的訪問對象為已婚女性。我清楚師奶被負面化的情況並非只有女性的參與，當中亦有男性的參與。我認同師奶負面化與性別問題有關，但亦可以是一個刻板印象和身份認同的問題。社會上已充斥著有關男性與女性對立的研究，我希望帶出一種新的角度去看香港師奶負面化的問題。女性間的他者化，及其衍生的次等化就是我希望研究的，故是次研究的受訪者只集中在女性。

至於只找已婚女性的原因在於已婚女性的身份與師奶最為接近。沒有結婚的女性不會被認為是真正的師奶，就算她們被稱為師奶也只是一種形容或開玩笑。根據我訪問所得，師奶的最基本條件是已婚。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較有可能進行身份認同理論中建構「他者」或劃分界線的工作，故而針對已婚女性來分析使本研究能做得更聚焦和深入。

是次研究共訪問了八位已婚女性。當中有五位認同自己是師奶，其餘三位則認為自己不是師奶。五位認同自己是師奶的受訪者中有全職家庭主婦和從事藍領工作的女性，而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受訪者都是從事白領工作。

為了增加訪問的靈活性，所有訪問都以半結構方式進行。除了數條的核心問題之外，其他問題都是隨著受訪者的答案再追問。

### 核心問題

1. 你覺得師奶的形象是怎樣的？
2. 你是師奶嗎？為什麼是/不是？
3. 如果不是，你覺得你們之間的分別在哪裡？
4. 你對師奶的認識和形象是從哪裡來的？

大部份的訪問都是面談的，而進行訪問的地點大多為受訪者的家中或附近的餐廳裡。當中有一位受訪者不願面談，只願透過電話作訪問，受訪者拒絕面談令我失去了觀察她的機會。

我嘗試用人類學家經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參與觀察來收集資料。但我發現要進行參與觀察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故只能做一個系統化的觀察者。我於研究初期因時間上的考慮而放棄了參與觀察中建立關係的步驟，改為利用和加深現有關係。尋找受訪者的管道大多是經身邊朋友介紹，或是找自己周遭的人作訪問。有不少的受訪者都是我朋友的母親。我跟她們都不認識，基於我與她們子女的友誼才願意接受訪問。與我特別要好的朋友的母親更成為我的主要受訪者。這正是我利用現有關係的其中一些例子。但這種利用現有關係的方法也有其弊病。由於一些受訪者只是為了子女與我的關係而接受訪問，所以我還是不能像傳統參與觀察般打破自己與某些受訪者間之隔膜。有時候就會出現如之前所提到，受訪者只願透過電話接受訪問的情況出現。

為了可以尋找更多的受訪者，我跟隨母親到茶樓和街市，經她的介紹來認識更多已婚的女性。雖然我跟其中一些只有幾面之緣，未能做任何訪問，但即使我只能做一個旁觀者，透過記錄她們之間的對話和她們跟周遭人的交流，我也能從中獲得一些新的想法。這都為本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在二手資料方面，一些有關婦女角色、身份認同、香港女性、師奶等學術研究的文獻都是我主要的參考資料。此外，大眾傳媒也為本研究提供了資料以探討大眾傳

媒在建構師奶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新聞報紙和電視劇中對於師奶形象的描述，以及針對這些描述所作出的回應都可供探討傳媒如何影響大眾對師奶的認知。

政府統計處的統計調查也不能忽視。它為本研究提供了一些單憑個人之力沒法獲得的數據資料以作分析。

## 文獻探討：

本節將會列出一些與本研究有關的參考文獻。當中包括師奶的意義與其演變的原因、社會對女性的新舊價值觀交織而成的協商空間，和一些有關身份認同的理論。我將會在本節說明這些文獻對是次研究的重要性和啟發性。

### (一) 師奶的意義

#### 師奶的起源

到底什麼是師奶呢？冼韻姬(2004)曾對師奶起源作一個簡介，指出較多人認識的師奶原意共有三個：1.) 對尋常已婚女性的稱呼，2.) 師父之妻，3.) 為嬰孩餵哺母乳的婦女。

#### 對尋常已婚女性的稱呼

根據詞典《廣州大觀》，師奶與「內人、內子、老婆、蔽眷、我的女人、尊夫人及太太」等稱謂相通(廖、趙、廖 1948)，泛指已婚女性。冼韻姬(2004)在其研究中提到三、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國社會階級觀念較重，亦非常著重名份。尋常百姓的已婚婦人被稱為師奶，而身份地位較高的、達官貴人的妻子才有資格被稱為太太或夫人。但隨著共產黨掌權，社會階級重組，依附於階級身份的稱謂失去了原有的象徵意義。太太和夫人逐漸降格成為尋常已婚女性的稱呼，取代了師奶原有的位置。

#### 師父之妻

根據《廣州話方言詞典》，師奶原指「師母，或稍有社會地位的人之妻，後來用作對一般年紀稍大的婦人的尊稱」(饒、歐陽、周 2009)。香港尚未推行免費教育時，拜師學藝於草根階級中很常見。「讀唔成書唔緊要，最緊要學番門手藝」這話更反映了當時師徒制的盛行程度和認受性。當時的師父地位甚高，稱師父的妻子為師奶屬尊敬之意，與奶奶(祖母)這類長輩的稱呼相近，絕無貶意。

#### 為嬰孩餵哺母乳的婦女

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副教授廖國輝認為，「師奶」原應為「司奶」。「司」是動詞，是負責或管理的意思，而「奶」則是名詞，是哺乳或餵奶的意思。「司奶」是指負責餵奶的女性，尤指母親，詞意中性(香港電台 2008)。

總括而言，以上三種說法都指出師奶的原意並無任何貶義成份，語意中性，甚至褒義。司奶之說法如冼(2004)所提及，是較功能性的，以婦女餵哺的功能來命名。

而首兩項說法(尋常已婚女性的稱呼和師父之妻)則以婦女的婚姻身份作為稱呼婦女的依據,她們的稱謂全取決於其丈夫的社會地位。這顯示出當時已婚女性的依附角色。

### 師奶意義的演變

從師父之妻的說法可見,師奶一詞於早期帶有尊重意味。而《香港話詞典》亦指師奶是「對中年以上較有身分婦女的客氣稱呼」(吳 1997)。即使是尋常已婚女性和司奶的說法未必褒義,但亦無涉及任何負面意味,詞義較為中性。

洗韻姬認為師奶的原意雖然並無今日的貶義成份,但因當時的普羅婦女都是出身於草根階層,故師奶一詞漸漸成為低下層社會圈子的慣用語,令師奶沾上了環境賦予的草根意味,出現了低俗的含意;「八十年代的師奶是無知的象徵」(洗 2004),洗認為自七、八十年代開始,師奶被邊緣化為落後和無知的一群。

何式凝(2009)的研究中也提到了師奶意義的演變過程: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師奶是一些因丈夫的地位和權力高而受到尊敬和有享有較高社會地位的已婚女性。師奶的身份於當時可以說是一種榮譽;在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師奶一詞變得大眾化,泛指已婚女性。與洗的發現相近,何認為師奶的含義在這個時期開始傾向負面化,何和洗都把香港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數目增加和「女強人」(經濟獨立女性)的出現歸入師奶出現新意義的原因。自七、八十年代開始,香港經濟急速發展培養出香港人著重賺錢能力的價值觀。在這種情況下,女強人令留在家裡照顧家庭的師奶被邊緣化,被視為男性的經濟負擔。未能擺脫傳統性別角色,加上不能如女強人般賺錢,令師奶陷入了「雙重邊緣化」的困境(洗 2004),風光因而不再。演變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香港網絡大典》把現代的師奶解釋為「太太的俗稱,主要是街坊之間的招呼用詞,也可用作嘲諷那些不施脂粉,外觀較土,儼如傳統家庭主婦般的未婚女士。」由此可見,師奶的意味變得負面或中性,不再含褒義。

洗和何二人對於師奶意味如何演變的研究十分重要。她們指出香港經濟和教育政策的發展與現今師奶負面化和邊緣化之莫大關係。洗所指的雙重邊緣化尤其重要。她強調了社會個體在師奶負面化和邊緣化過程下的參與。這正與本研究要點相符:師奶含義之改變包括了客觀條件和人們的主觀詮釋。而她所指的「雙重」邊緣化更提醒了我不只男性將師奶邊緣化和負面化,即使是女性也同樣參與在其中。

### (二) 新舊女性價值觀交織而成的協商空間

上一節提到香港教育政策和經濟模式的改變令女性地位得到革命性的改變。有不少的婦女得到更高的社會地位,但同時亦造成了部份女性(家庭主婦)的負面化。在本節,我將會重點探討《七十年代香港婦女雜誌中的「時代女性」》的研究》(高 2006),指出香港女性在追求成為自主獨立的職業女性時,仍受到傳統價值觀的一定約束。

透過高的研究,我發現在社會對女性的新舊價值觀的結合下,女性角色在香港社會留下了一個可「討價還價」的空間,這有助解釋不同女性對師奶的詮釋出現差異的原因。

高所研究的背景為七十年代的香港,當時的香港經歷了教育政策的改革和經濟模式的轉換。職業女性的正面,甚至高人一等的形象由當時開始形成。而職業女性又正是師奶負面化中的一個必要因素,故認識七十年代的「時代女性」如何被建構和吹捧都是必要的。此外,我認為現代女性所面對的困難和約束與七十年代女性所面對的

相近，兩者都因為社會對女性的價值觀未得到統一，而同樣受著新舊女性價值觀的影響，所以高針對七十年代女性的研究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

### 對「時代女性」的吹捧

#### 「時代女性」的定義

「時代女性」一詞於七十年代開始被公眾使用，用作比喻「一些接受新思想，相信女性可以在公共領域中有所作為的女性」（高 2006：83）。而被稱為『時代女性』的都是外出工作的婦女。但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職業女性都是「時代女性」。與師奶一詞相似，兩者都不能單以客觀準則（有沒有工作）來定義，因為是否符合社會對該身份的刻板印象才是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 「時代女性」的形象

七十年代的「時代女性」代表著摩登和前衛。她們的形象在女性雜誌中是非常正面的。根據高的研究，女性雜誌中呈現的「時代女性」獨立自主、充滿活力、知識廣博、思想開朗、懂得表現個性，更有配合潮流的外型。這與三從、四德、「女子無才便是德」等中國傳統價值觀違背。她們「思想開朗，勇於接受新思想，努力擺脫傳統道德對於女性角色的限制，追求公平、獨立自主的新生活」（高 2006：84）。這種形象使「時代女性」得到很高的評價。《優美》雜誌(1978)在「傑出女性－鄭藹雪」的介紹中指「女性看見她會以十分妒忌的眼光瞧」（轉引自高 2006：91），可見當時「時代女性」的形象受到社會的吹捧。

#### 「時代女性」與全職家庭主婦的對立

隨著雜誌及大眾對「時代女性」的高度評價和吹捧，社會上有不少人都被這種意識形態影響。高根據七十年代的女性雜誌內容，歸納出雜誌「往往喜歡以『時代女性』一詞形容一些有成就的職業女性，漸漸使人認為時代女性就是職業女性，同時是『成功』、『傑出』的象徵，全職家庭主婦比起職業女性就顯得卑微，甚至是失敗者」（高 2006：83）。

「時代女性」受到社會的吹捧時，經常有全職家庭主婦作陪襯或對比。例如《超群家庭雜誌》(1977)中對「時代女性」的描述為「半邊天下的另一半的支柱，她們服膺『勞動力解放』的原則，不再專做廚房的或家庭育嬰的工作…」（轉引自高 2006：83）。

我認為這些描述都以全職家庭主婦的形象來反面說明何為「時代女性」。這表現出「時代女性」與全職家庭主婦的對立性，同時亦反映社會對女性的舊有價值觀開始受到衝擊。安守家中的全職家庭主婦不再得到社會的崇高評價，取而代之的正是事業有成的「時代女性」，這種對立性與何式凝(2009)提到女強人與師奶的對立性相似。

社會對「時代女性」的吹捧形成新女性價值觀。過去要求女性「三從四德」、「三步不出閨門」的觀念已被視為過時，轉而要求女性獨立及投身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父權思想受到這種「現代」價值觀挑戰。

## 根深柢固的傳統價值觀

### 「女強人」的負面化

高認為上文提及過的「女強人」可能是因為新女性與傳統女性的形象大相逕庭而被加上一些負面含意。根據高的解釋，「女強人」一詞本用來形容女性有強人本色，做事有魄力，努力為事業而拼搏。但後來卻被負面化，被指為欠缺女性氣質。《超群雜誌》(1979)在標為「女強人是怎樣產生的？」的文章中就指「女強人」是一個「心狠手辣，盛勢凌人，喜歡將事業放在第一位，丈夫家庭排到最末，而且有點像慈禧太后，喜歡駕馭男人」（轉引自高 2006：95）。這種對「女強人」的負面化於當時的雜誌內並不罕見。高把「女強人」的負面形象解釋為傳統對現代女性價值的一種反擊。

我認為雜誌吹捧「時代女性」，但同時又貶低「女強人」的現象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女性價值觀存在不同意見。這證明了女性角色和價值觀是一個流動的概念。它可以透過人們的主觀詮釋而不停改變。這就是社會對女性角色和要求的一個協商過程。

### 全職家庭主婦的滿足感和期望

社會出現對「女強人」的抨擊，但同時亦有人表現出對作為全職家庭主婦的滿足。《優美》(1978)一個女讀者投稿表示自己樂於做一個家庭主婦，更認為自己的生活比職業女性更滿足，她指自己「是個上好和標準的家庭主婦，把家裡收拾好…也許，我被稱為不中用的女人，沒有才能和智慧的女人，但，我是我丈夫的女人」（轉引自高 2006：129）。

我認為該名讀者的投稿代表了某些女性的心聲。她們滿足於傳統社會角色，為自己把家事和家人照顧好而感到驕傲。種傳統價值觀在現今香港仍存在，這正是一種對於女性新價值觀的反擊。

### 社會對女性價值觀的討論空間出現

在讀過高的研究後，我發現七十年代「時代女性」的形象雖然受到社會吹捧，但她們仍然需要面對傳統價值觀的衝突。尤其是職業女性面對工作和家庭的拉扯時，往往感到無所適從。社會一方面的聲音吹捧著挑戰父權的新女性觀念，但另一方面又有其他聲音在捍衛傳統的價值觀。這促成了一個有關女性角色和價值觀的討論空間。

我在前言部份已提過，認為自己是師奶的與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對於師奶的詮釋不同。我認為這是由於社會上對女性角色的觀念仍未統一。女性角色的觀念由七十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的可協商空間，故社會容許「各說各話」的情況出現而又不會使人感到奇怪。這種協商空間我將會在往後的分析部份再作討論。

### (三) 身份認同理論

上一節解釋了師奶詮釋的多變性在於新舊女性角色和觀念仍未能結合或統一。在本節，我希望透過分析一些身份認同理論中有關我者和他者的建構過程，探討師奶身份如何和為何被負面化。

何(2009)在其研究中提到的「女強人」與高(2006)提出的「時代女性」有一個共通點：兩者都與師奶存在對立性：有經濟能力的「女強人」或「時代女性」跟沒有經濟能力的全職家庭主婦對立。她們相對峙而存在。「女強人」和「時代女性」的出



現，強化了全職家庭主婦就是比較落後的師奶—這個刻板印象。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為了把師奶界定為他者，會主動建構或強化有關師奶的刻板形象。這正是本研究希望強調的一不同女性間對師奶不同的主觀詮釋，故本研究不能忽視身份認同理論。

### 界線劃分

根據 Michele Lamont 的定義，界線指「我們用來分類物品、人群、實作，甚至時間與空間等的概念性劃分」（轉引自藍佩嘉 2008：40）。這些界線可以由多個層面，包括認知、制度及互動等組成。

Lamont 認為界線的出現是為了讓社會上某些佔有優勢的人維持或捍衛現存的社會關係和不平等 (Lamont and Fournier 1992)。社會中的優勢階級常藉由排外 (exclusion) 來確保界線與鞏固地位。為了持續把較弱勢的人排斥在外，這個界線會不停的改動或重劃，甚至有多個劃分的準則出現。其他群體則透過使界線模糊、可穿透，或重新建構另類界線等方式尋求被納入 (inclusion)。這種「畫界工作」（轉引自藍 2008：40）在日常生活中時有出現。這讓文化得以再生產，並鞏固了既有的社會關係和不平等。

引用 Lamont 的概念，藍 (2008) 在研究東南亞幫傭在台灣新富家庭中工作的情況時，指台灣女雇主為了維持自身的優越階級和種族地位而劃分自己與幫傭之間的界線。女雇主持續透過具體的行動，來確認與其家務勞工之間階層化的差異。「當女雇主試圖在女傭與女主人之間刻畫一條分明的界線時，她們同時參與了階級差異的想像」（藍 2008：169）。

Lamont 所提到的界線對本研究非常重要。群體間的畫界反映了人們在身份建構過程中的主動性。至於藍的研究亦為本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考。它以台灣家庭僱用女傭的真實例子說明了在身份建構的過程中，少不了群體對他者的想像差異。這讓我聯想到：在是次有關師奶的研究中，認為自己是師奶跟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之間也有一道由其中一方 (我認為是不認同自己為師奶的已婚女性) 劃分和強調的界線。我將會把這種「畫界工作」套用到有關香港師奶的研究中，探討師奶被排外與尋求被納入的過程。

### 東方主義引申出來的「師奶主義」

東方主義提到西方人把東方人貶低或把東方說成相對的他者的原因和過程。學者愛德華·W·薩義德 (1999) 提出東方主義，指“東方”屬於西方建構產物。東方被視為歐洲文化的競爭者，是歐洲最常出現的他者形象之一。歐洲 (或西方) 將自己界定為與東方相對照的形象、觀念、人性和經驗，旨在為東西建立一個明顯的分野，從而一方面定義西方，一方面突出西方文化的優越性。他又認為東方和西方因相對峙而存在，故這兩個地理實體實際上是相互支持並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對方 (薩義德 1999)。

薩義德 (1999) 又指「東方」和「西方」這樣的東西和地理區域都是人為建構起來的。西方有關東方的知識不是全部來自事實或現實，而是從先入為主的原型設想所有的“東方”社會團體從根本上是彼此相近的，而又根本與「西方」社會相異。即使西方人要重新認識東方，他們大都跳不出這種論述的框框。

薩義德認為西方的大眾下意識地認為一些東西為東方的，因為東方的觀念已經被建構成耳熟能詳。薩義德根據 Michael Foucault 有關權力的理論，指出有西方的東方學者因其知識而擁有對大眾論述的權力。他/她們把東方主義深化，替東方人說出東方的特徵。薩義德視此為一種霸權。東方學家為大眾選材，只挑選一些他/她們認為是東方的特徵來顯現。但讀者卻忘記了東方學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將被文選重新結構起來的東方視為東方之全部。結果，「客觀的結構(東方之實際所指)和主觀的再結構(東方學家對東方的表述)被混為一談」(薩義德 1999)。而這些東方的特徵隨之彷彿是自然顯現的。

我認為東西對立下的東方主義與香港師奶被負面化的原因和過程都反映了相似的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正如前言所提及，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在定義師奶時大多會用一些比較負面的詞語形容。這些不覺得自己是師奶的「女強人」或「時代女性」先入為主地幫師奶建構一種形象。而這些特徵/形象都是負面的，從而表現自己跟師奶不同，而師奶又比不上她們，顯示出自己的優越性。這種挑選某些特徵來建構他者的方法與東方主義相近。

需要留意的是，在本研究中我只針對女性間的他者化過程，但不表示我認為香港師奶的形象被負面化的過程單靠一個對立的群體(女強人/時代女性)便可造成。我只是希望在本研究中強調女性在這個師奶被負面化的過程中所擔任的角色。社會上已有不少人意識到男性和女性間之對立，有不少人都把女性受壓制或被歧視的罪名安在男性身上，但我不認同將香港的性別問題全歸咎於男性的做法。我希望本研究可以引發大眾從其他角度去看性別問題，這也是我只針對女性進行研究的原因。

有學識、有事業的女強人積極加強建構一些師奶的負面形象，強調自己跟「沒有學識」的師奶的差異，我認為可以用一個發展自東方主義的新詞來形容這種情況--「師奶主義」。在分析的部份，我會把東方主義套用到本研究中，根據收集的研究資料，進一步說明我所謂的「師奶主義」，討論師奶的負面形象如何被他者建構出來。

## 研究結果及分析

本節將會展示和分析我的研究結果，補充我認為上述文獻不足的地方。我希望強調不只客觀環境改變會引致師奶負面化現象，人們的主觀詮釋亦為其中因素。已婚女性間劃分界線，以他者來定義自己的他者化過程更是強化了這些有關師奶定義的主觀詮釋。然而，這些有關師奶形象的主觀詮釋，都並非單向的由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完成。一些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也有參與在其中。這兩類已婚女性的詮釋可能會出現差異，而這正好證明了社會對師奶，甚至對女性的價值觀仍有一個可協商的空間。

經過一連串的訪談和觀察後，我發現了幾個要點，現歸納如下：

1. 所有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受訪女性都沒有接受免費教育。
2. 所有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受訪女性都從事白領工作。
3. 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受訪女性留在家做家事的時間比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受訪女性多，但兩者都負責家中大部份的家事。
4. 不認為自己是和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受訪女性對師奶的詮釋有差異：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受訪女性大多以比較負面的詞語形容師奶，但認同自己是師奶的受訪女性卻會以較正面或中性的詞來形容師奶。

從上可見，1.) 和 2.) 都反映了香港的教育政策和勞動市場下女性不同的職業性質都是影響已婚女性是否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因素。3.) 則反映了傳統婦女角色(照顧家庭)仍然影響著香港的女性。已婚女性即使在追求個人在工作上的滿足感時，仍然不能只顧工作而不理會家庭事務。在女性獨立自主和中國傳統女性相夫教子的觀念共存下，出現了一個協商空間。4.) 的結果是我認為最有趣的發現。這種不同詮釋的出現反映了已婚女性間如何透過建構他者來定義自己的身份認同，而師奶的定義在不同受訪者的口中又有不同的主觀詮釋。這都證明了不只客觀條件的改變會引致師奶負面化，人們的主觀詮釋亦然。師奶的定義因而在不同受訪者的口中出現不同的主觀詮釋。

這五項研究結果綜合起來反映了客觀的因素如教育政策的改革和經濟轉型對社會個體確實帶來影響。在是次研究中，客觀的因素影響了女性的教育程度、行業性質分佈。這都是決定女性身份認同的條件。不同的教育程度和職業成為了已婚女性間用來區別他者的一些標準。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利用他者(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女性)的負面刻板印象來強調自己的優越性並以此來定義自己。故出現了女性間的他者化，甚至階級化。本研究將會在討論的部分作更深入的分析。

### (一) 客觀環境改變導致師奶負面化

#### 普及教育提升女性在職場的競爭力

本部份將分析師奶的負面化和人們對師奶的詮釋如何受到香港的教育和經濟發展影響，而這種客觀環境下的改變又如何成為師奶日後被負面化的基礎。

#### 教育政策之改革

二戰後的香港自四十年代末開始出現學位短缺的問題。戰後嬰兒潮和中國移民潮令適齡學童的數量急速上升。在學位短缺的情況下，失學兒童時有出現。在普及教育推行前，香港女性在中國傳統觀念如「女子無才便是德」和「重男輕女」的影響下，常會失去就學的機會。於六、七十年代時，有不少的小學女生在完成小學後便要放棄學業，到工廠上班，為家庭賺取生活費，供家中的男性繼續升學(轉引自高 2006: 27)。在 1969 年公映的香港電影《郎如春日風》中有一首名為《工廠妹萬歲》的插曲。當中一句「大把工廠女 賺錢養屋企」的歌詞正反映了當時為家庭而停學的「工廠妹」的普遍性。一些失學女性為了可繼續學業，會選擇日間到工廠工作，晚上到夜校讀中學課程。未能受惠於強制普及基礎教育的心蘭就是上夜校的其中一員：

我十二歲開始到工廠工作，織毛衣，我自己供自己讀夜校，當時很流行讀夜校的...

從上可見，在強制普及基礎教育實施前，除了小部份上流人士的女兒外，香港普遍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和教育程度都偏低。為了繼續讀書，女性更可能需要到工廠打工供自己讀書。直至香港政府推出政策改善，香港女性的就學機會和教育程度才得以緩緩上升。

香港政府於一九七八年起透過公營小學及中學(包括官立、資助及按額津貼學校)實施九年免費強制普及基礎教育，包括六年小學和三年初中教育(現在 334 新學制下為十二年)。這讓年輕人口的就學機會增加。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在一九八六年，

十五歲及以上的女性人口中，只有 50.0%具有中學及以上教育程度。到了二零零九年，女性的相應比例上升至 73.9%（政府統計處 2010）。這顯示了九年免費普及基礎教育在提高香港女性教育程度方面的成果。

我認為師奶的含義改變與教育普及有關，學校把「師奶」定義為一些俗語。由於「師奶」一詞被視為口語，太太才是比較文雅的書面語，故在香港的中國語文教科書上也不能找到「師奶」。當我要找師奶的書面解釋時，也只能在一些方言詞典中找到。這影響了人們日後對師奶這個詞語，甚至這個身份的詮釋。認同自己是師奶的惠儀對於師奶的看法就是受到學校教育的影響，她表示：

我小時候，有記性以來都叫認識的太太作師奶，但在讀過書後，不知道為什麼，覺得師奶的叫法比較俗，叫別人作師奶是一件不禮貌和讓人不好意思的事，所以我都教我女兒叫人阿太，不叫師奶。

重看師奶一詞的起源，師奶被視為一些廣州方言，而非一些正統的書面語。在普及教育下，人們在教科書中找不到師奶一詞。而作文的時候，師奶也會被視為太太的口語而不得使用。經過學校多年教導書面語和口語的分別後，學生如惠儀可能就會把師奶視為較俗的稱呼。在她/他們長大後，更把這觀念——師奶是不禮貌的叫法傳到自己的子女。這個本來針對詞語運用的觀念，最後卻被聯想至師奶身份上，我認為這間接導致師奶在教育普及後變得負面。

此外，九年免費強制普及基礎教育在提高普遍香港女性的教育程度的同時，也成就了女性間的差異。在教育普及以前，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較低。那些未能受惠於普及教育的香港女性，以及在七十年代從內地移民到香港的女性佔現代中年女性的大部份。她們的教育水平都是不高的。女性學歷低於七、八十年代很常見，故不會是一個問題。可是，到了今天的香港，教育已經變成必要的。初中教育程度已經變得最基本的了。當那些沒有受惠於普及教育的女人與現代享受普及教育的女人相遇時，兩者之間的分別就變得很明顯了。教育程度更成為了女性建構他者的其中一個指標。有些受訪者表示一個女人的教育水平會決定她是否一個師奶。在這樣的指標下，學歷比較低成為了師奶的刻板印象之一。

### *教育改革與香港經濟轉型之配合*

教育對於提升個人的社會地位及經濟能力十分重要。教育程度愈高，投身較高職級工作的機會愈大。普及教育在香港經濟轉型的情況下提供了機會讓女性擺脫作為藍領女工的命運，晉身白領行業，使其社會地位得以提升。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迅速發展密集式工業，對工廠勞工的需求大增。這些藍領工作對學歷要求不高，故當時的女性多從事藍領工作。由八十年代開始，香港逐漸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服務業的蓬勃發展為女性就業帶來優勢，但這些工作都僅開放予教育水平較高或有職業技能的女性。教育的提高讓女性的職業流動性有所提高，可見教育程度在現時與工作之間的緊密關係。

香港於七十年代開始普及教育。教育水平提升加上經濟轉型令受薪的女性在職人士增加，香港女性不再只局限於傳統的女性角色（相夫教子），而可以選擇提升自我能力，為個人事業而努力。工作更為女性提供了一個作為別人妻子或媽媽以外的角色。在寫字樓工作的美庭就曾指出這一點：

我在家裡照顧女兒時是一個師奶，但我在工作的時候就不是師奶。我們在工作地方不會叫別人師奶，會以阿姐或對方的名字來稱呼別人。如果在辦公室稱呼別人為師奶，會覺得是在開玩笑。

美庭所說的表示出女性在職場中的得到另一個身份，這為已婚女性提供多一個有別於別人妻子或媽媽的身份。她們變得不要倚靠別人來建立自己的身份。就業機會的提升讓一些女性如雪琪和朗程定義自己為職業女性而有別於師奶。簡單而言，工作提供了其他身份讓女性定義自己，把師奶排除在外。

學歷較高的職業女性出現後，一些專注家庭事務的女性於此時始明顯與同齡或同樣已婚女性存在差別。工作與否，甚至工作性質更隨之成為定義師奶的一些指標。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雪琪在被問到師奶的定義時，以工作為區分自己跟師奶的指標：

你覺得師奶是怎樣的？

師奶就是沒有工作，留在家中的。我有工作，所以我不是師奶。

那在你辦公室裡都沒有師奶嗎？

那也不是…我覺得做清潔的大嬸們雖然有全職工作，但她們是師奶啊！

在以前的香港，女性的學歷和就業問題不被重視。但隨著社會大環境之改變，以前以為是是正確的選擇，到了今天可能會變成是錯的。美巧的經驗說明著這一點：

我以前在大陸可以選擇讀書，但我自己不想讀。以前不懂字可以到工廠打工，但現在不會找到工作了，誰會請我啊？

朗程亦看到社會結構改變而引致的女性角色改變：

我覺得上一代的女人都不是特地留在家中的。她們工作和讀書的機會比較少嘛，當時又流行生很多小孩，她們才要留在家做家務。

廿一世紀的社會被喻為知識型社會，教育知識水平變成分配資源的重要指標。由於社會型態的改變，學歷低的人得到的就業機會和選擇亦相應較少。正如上文所提及，有些女性因年齡問題未能受惠於普及教育政策。這些女性在職場上自然無法與普及教育的女性競爭。一些留在家中主理家務的女性或從事低學歷要求的職業女性，在資本主義橫行的香港社會中變得相形見絀。這種因客觀環境改變而擴大了的差異為師奶被負面化的情況奠下基礎。

## (二) 在客觀環境改變下堅守的性別規範

上一節探討了客觀因素的改變如何作為師奶含義改變的基礎。由本節起，以下數節將會討論人們的主觀詮釋在師奶的含義改變過程中所擔當的角色和其重要性。本部份著重分析新女性價值觀伴隨客觀環境改變而出現，但傳統的性別規範仍然揮之不去，故促成一個有關婦女角色的可協商空間。

如果香港社會強調女性應該留在家中相夫教子、持家有道、不用到外工作的話，全職家庭主婦就會得到褒揚。相反，如果社會反倒認為女性應該獨立自主、外出工作的話，全職家庭主婦就會被貶低了。簡單而言，我認為師奶含義的褒貶取決於香港人

如何定義女性性別角色和觀念。由於香港女性性別角色和觀念同時受到開放自由的新思想和中國傳統思想衝擊，師奶在社會上故有貶意和中性的解釋同時出現。

### *新女性價值觀伴隨客觀環境改變而出現*

香港女性在教育普及下得到更高的教育程度，並因經濟轉型而得到更多的就業機會。事業女性與中國傳統女性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中國傳統價值觀要求女性相夫教子、三從、四德、三步不出閨門，但香港人多年來都受著殖民地文化影響，這些思想被視之為「落後」和「迂腐」。

早於七十年代開始，在歐美文化鼓吹自由開放、女性自主、獨立的影響下，香港女性已經察覺自己的身份以及角色與過去有很大分別，中國傳統女性價值觀被視不合理，甚至「低能」，舊日的眼光不能套在今天的時代女性身上（高 2006）。這反映了早於七十年代，社會已經在建構一種新的女性身份。那就是當時女性雜誌中描述，有別於家庭主婦（包括師奶）的時代女性。時代女性的身份因為當時社會的吹捧而得到比一般婦女較高的社會地位。到了今天，香港大眾仍有不少人受這種思想和價值觀影響。他們認為女性需要獨立自主，擁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工作，對中國傳統女性價值觀作出批評。朗程就是其中一個好例子：

我喜歡工作。最主要工作可以見人，與人溝通。這樣與自己的先生和兒女才有話題。如果只懂飯菜的事，人家會覺得你「好娘」（落後）、好悶…做一個全職家庭主婦很浪費。這樣會消磨個人意志…以前說「男主外，女主內」，現在還是「公一份、婆一份」（丈夫和妻子都工作）比較好。

新的女性價值觀自七十年代開始受到吹捧。仍然奉行中國傳統女性角色的已婚女性則被視「好娘」。換言之，只留在家中做家事，照顧丈夫和兒女的已婚女性，因為客觀條件改變，加上社會出現新的女性觀念而被輕視。師奶也被視為一種含貶義的稱呼。

### *揮之不去的傳統觀念*

雖然事業女性受到社會新思想的吹捧，但中國傳統對於女性的角色期望和價值觀仍然揮之不去。雖然女性得到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但這並不代表女性可以放下其傳統的性別角色。女性仍然視自己或被視為照顧家庭的必然負責人，可見相夫教子的思想仍然影響著香港人。

女性照顧家庭仍然被視為一種女人的美德，甚至是天職。有不少香港人會把中國傳統性別角色說成是上一輩的觀念，但我發現這也是現在一些年青人的觀念。網上討論區中一篇有關「三不女人」（不做家務，不帶小孩，不下廚房）的文章引起了一些香港年齡較低的網民的一些爭論。文中指三不宣言反映了新世代女性的心態。有網民回應指那些女性不想做家務就不要結婚，更有網民表示如果三不宣言在香港流行起來的話，香港男人都不知道可以到哪裡找老婆了（香港討論區 2010）。我認為網上的討論反映了香港社會對女性仍存有傳統的性別角色規範—照顧家庭，同時亦討論證明了，即使是較為年輕的香港人都「傳承」了這種傳統的性別角色觀念。雪琪強調自己是職業女性的同時，她亦受到了傳統觀念對她的反擊：

我老公會怪我經常不煮飯給他吃，像今天(他們正在吃外賣的薄餅)…我媽也會說我懶惰，不煮飯，如何做人家老婆之類的…

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職業女性違反了一些傳統性別角色。為了「與父權討價還價」(轉引自藍 2008: 134)，她們貶低師奶，把自己違反性別角色期望的事合理化。在面對傳統性別角色的批評時，我認為這些職業女性強調了新女性觀念—在外工作、獨立自主的優越性，把師奶視為中國傳統女性性別角色和觀念的代表。她們透過貶低師奶作為對傳統性別角色規範的反擊，並把自己追求獨立自主的選擇合理化。這引致了女性間的畫界線工作，而師奶亦因此而被負面化。

揮之不去的傳統觀念對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職業女性而言是一種挑戰，但它卻幫助了那些認同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為師奶這身份作出辯護。在新的女性價值觀下，師奶被視為落後和脫節。但由於香港社會仍存在一些對傳統觀念的推崇，認同自己為師奶的人故可透過強調傳統觀念中的女性美德來把師奶的含意變得中性化。

師奶的詮釋在新舊思想的爭持下可以出現不同的說法。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對於師奶的詮釋都是負面的，但認同自己是師奶的，她們的詮釋就偏向中性的。這在我的研究結果中可看到。

### (三) 排他與尋求納入

本節將會把上節提到的畫界線工作說得更清楚，分析不認同自己為師奶的已婚女性如何為自己與師奶這個他者畫線，把師奶這個他者排除在外。而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女性又如何尋求納入，不被排斥。

#### 由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所畫的界線

師奶是胖胖的、不會刻意打扮、專注看那裡的東西比較便宜、是個家庭主婦…

雪琪

師奶的工作是全職家庭主婦、不注重打扮、孤寒(小氣)、看錢很重…

朗程

師奶有水瓶的身材，外型不太好看…在家工作…

美庭

以上都是一些不認同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對師奶的定義和印象。這些刻板印象都是比較負面的。這方便了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把自己跟負面的師奶分開，是一個進行他者化的過程。

不認同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在區分自己與師奶的時候，普遍以職業、性格和外型作標準和說明。這些界線的標準是富彈性的，不認同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不停的更改界線，為的就是把自己與師奶這個「他者」分開。

不認同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第一條畫的界線就是在工作方面。所有不認同自己是師奶的受訪者都表示她們心中的師奶是沒有工作的，是一個整天在家的全職家庭主婦，雪琪表示：

我不是師奶，我是職業女性。我大部份時間都在工作，但師奶就是全職家庭主婦，大部份時間都是留在家中，照顧家庭。

這就是有關師奶的第一個刻板印象：師奶通常都是家庭主婦。基於這個刻板印象，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發展出其他有關師奶的刻板印象。朗程對師奶的印象跟雪琪相同——「師奶就是全職家庭主婦」，朗程更認為師奶的性格和外型都受她們不用工作的情況影響：

在性格方面

師奶的性格比較孤寒，看錢很重，因為經濟不獨立，要倚賴丈夫…師奶因為經濟不獨立，所以看錢會比較重，我們經濟獨立的就比較捨得用錢。

在外型方面

師奶在打扮上比較不注重儀容，因為她們的人脈網絡不廣，要去的都只是街市和超級市場，見的人不多…相反，我們在外工作的，人脈較廣，就會比較注重儀容。

基於師奶是沒有工作的刻板印象，朗程把她對師奶的其他刻板印象合理化。這些刻板印象都幫助了朗程把師奶說成是他者，與她的「我們」不同。對朗程而言，職業就是她跟師奶之間再主要的界線。但我認為她們之間的界線並非單由客觀的職業畫成，朗程把師奶說成跟自己不一樣的同時，已經加入了自己的詮釋和想像，她主觀的認為師奶都不打扮，而且流連的地方都離不開煮飯買菜。經過她的詮釋和想像後，師奶跟她的差異變得更大、更明顯，這就是畫界線所達到的他者化過程。

### 「師奶主義」

愛德華·W·薩義德(1999)的東方主義指西方國家的東方學家挑選東方文化的其中一些特徵來建立一個明顯的分野，從而一方面定義西方，一方面突出西方文化的優越性。我認為薩義德的觀念亦可套用在香港師奶的負面化上。

我認為香港社會大眾對師奶的認識都不可能是全面的。Michael Foucault 指有知識的人會擁有對大眾論述的權力。薩義德亦根據 Michael Foucault 的理論，指東方學家因有知識而有權力挑選東方的特徵來深化，從而造成東方主義。在「師奶主義」下，香港雖然並沒有如東方學家般有知識權威的師奶學家把師奶主義深化，但師奶學家所起的作用在傳媒，甚至一些網絡討論區、網絡百科全書中可找到。以前的人科技不如今發達，如果要公布一些理論或想法，他們要選擇出書，但如今有互聯網的幫助，任何人都可在網上發言，然後短時間內供其他人閱讀。這讓任何人都可擔當師奶學家的角色，為師奶建構一個想像的形象。

維基百科作為一個網上的百科全書，是其中一類的師奶學家。維基百科是一個人人都可編輯的百科全書，它正體現了每個人都可成為師奶學家的說法。維基百科在解釋師奶一詞時，同時亦為師奶建構了一個經選材和編輯的刻板形象。



它把師奶這個身份刻板化，當中一幅描繪師奶樣板的漫畫更可證明師奶的形象如何被刻板化，甚至負面化(見圖一)。在圖中的女性被視為師奶的樣板。她胖胖的、說話多、貪小便宜，又不注重打扮。這些都是維基百科為師奶建構出來的、比較負面的師奶形象。除了外形和個性的刻板形象外，師奶的角色也被定型為一家之「煮」，負責家裡的一切烹調。

我想說的是，在香港，任何人都可透過電視、電影、報紙、雜誌，甚至透過互聯網來獲得有關師奶的刻板印象，或是一些特徵。這些資訊都經過選材，作者們只挑選一些他們認為是師奶的特徵來顯現，但接收者卻忘記了這些選材過程，將被重新結構起來的師奶視為師奶之全部。結果有如薩義德(1999)所指「客觀的結構和主觀的再結構被混為一談」，而那些有關師奶的刻板印象和特徵隨之變成像是自然顯現的。

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為了把自己跟師奶以界線分開，透過對師奶某些已有的特徵加以想像和刻板化，把師奶建構成「他者」。在師奶被貶的情況下，那些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一方面可進一步把自己違反了傳統女性角色的身份合理法，另一方面又突出了自己的優越性，繼續「與父權討價還價」，我把整個現象稱為「師奶主義」。

### 師奶尋求被納入

不認同自己為師奶的已婚女性通過強調和刻板化師奶的一些特徵來突顯自己跟師奶的差別，希望把師奶排除在外。但認同自己為師奶的人同時間也在使界線模糊，或重新建構另類界線，使自己可以被納入，從而使自己的社會地位得到提高。

大部分認同自己是師奶的受訪者在定義師奶時，跟不認同自己是師奶的受訪者的答案有差別。認同自己是師奶的受訪者多以婚姻狀態作指標來定義師奶，美巧就是例子之一：

結了婚，嫁了人就是師奶啊！不管有沒有小孩，做了別人的老婆就是師奶！

美巧認為師奶的定義就是這麼簡單直接，我曾以女醫生和香港女明星張柏芝作例子，希望知道美巧這簡單的定義能否套用上：

女醫生又如何？嫁了人就是師奶啊…

那你認為張柏芝是否一個師奶？



圖一、描繪師奶樣板的漫畫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我就覺得她不像，她好像『癲癲地』。到現在做了小孩的媽，但她還沒有定性，她就是一個『十三點』（貶意指對方性格『癲癲地』），相反陳慧琳比較定性，她就比較像是一個師奶。

從美巧的答案中可見，她認為結婚後的女性沒有一個不是師奶，只有不像師奶的師奶。我認為美巧正在嘗試把界線模糊化：她把師奶與其他女性混為一談。不管有沒有工作，外型好不好看。在她的詮釋下，只要女性結婚了，大家的身份都是一樣。這種詮釋把原來被不認同自己為師奶的已婚女性擴大的、與師奶間的差距拉近，是一個師奶尋求被納入的過程。

美巧對張柏芝的批評亦表現出自己對於師奶身份有一份優越感。美巧曾跟我提過「師奶有責任感，要照顧家庭…不到你不做，也不到你不照顧（不可以不做，不可以不照顧）」。在她的眼中，師奶的形象為負責任、成熟、定性、穩重的女性，「還沒有定性」的張柏芝因而不像師奶。

與美巧的對話當中，不難發現她仍然深受傳統性別角色和價值觀影響：

做師奶是很平常的事，女大當嫁嘛，生兒育女，這些是女人的天性…願意做家務的才可以算是好女人，如果煮飯厲害，家庭會覺得好美滿…

美巧因受傳統性別角色和價值觀影響，對於自己作為一個全職家庭主婦而被稱為師奶並沒有感到不高興。她認為師奶很平常，有些時候更會因為自己的師奶身份感到自豪：

我聽過我女兒說，她的女同事會抱怨說寧願不放假，因為放假就要把小孩接回家照顧，工作比照顧小孩和家事容易呢！

我跟我老公說，他不要以為留在家中做家事很簡單，我真想讓他試試，他一定受不了。

除了把界線模糊化外，把師奶身份含義中性化，甚至抬高，都有助師奶抵抗不認同自己為師奶的女性所推行的排外畫界工作。更有可能改善師奶主義下的師奶被負面化的情況。

#### (四) 師奶對刻板印象的內化

師奶的形象，並非單向由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主觀詮釋。一些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也有參與在其中。本節希望指出：除了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女性會造成師奶含義的負面化，那些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女性在面對社會對師奶的刻板印象時，有時候會認同外界對師奶的刻板印象，並把它們內化。這種內化的過程某程度上強化了社會對師奶的固有刻板印象。

美巧曾暗地向我批評另外一個師奶（阿顏）「發神經」。而阿顏「發神經」的行為就是買了好多手提包放在家中：

她（阿顏）真是發神經！都不知道買這麼多袋幹麼！自己是師奶，竟然花這麼多錢去打扮，都不知道要節省金錢！我就不用買啦，我師奶不用這麼注重打扮…

美巧的話反映了外界對師奶的定義或期望，在師奶圈子中也是被套用的。美巧認為師奶就是應該看錢會比較重，而且應該沒有那麼注重打扮。阿顏大花金錢購買手袋的行為在美巧眼中就是不合理。但違反了這些期望的不等於不是師奶，只是不像師奶或變成「發神經」的師奶。

美巧跟我說一些有關別人的事時也再把師奶的刻板印象內化和強化：

…你不會知道的啦，我們師奶才這麼八卦！

社會意識形態對個人的影響很大。即使是一些有關自己的負面描述，在社會上被大眾多番使用和建構後，會漸漸潛移默化的對我們產生作用。從上述的例子可見，美巧腦海中對師奶的定義都是受到社會大眾影響的。她把外界對師奶的刻板印象內化了。她以一些大眾認同，甚至較為負面的師奶特徵來定義和規範自己和其他師奶的行為。這種師奶形象的內化令美巧更進一步地成為大眾眼中的師奶，同時亦強化了師奶的刻板化和負面化。

## 結論

在做這個研究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想一個切身的問題：生活在香港文化圈子的我，在做這個有關香港師奶的研究時，自己對師奶的主觀感覺會否把這個研究變得不客觀呢？有些人類學家早於六十年代開始反省人類學家的民族志研究，認為人類學家的研究只是在宣揚其主觀的成見。他們指「有較高社會權力和地位的人常常能夠把自己的文化或政治成見變成普遍的真理，而撤除或無視弱勢群體的不同觀點」（轉引自 Lavenda and Schultz 2007）。學者的批評喚起我的擔心，但亦提醒了我，絕對的客觀是不可能的。作為香港社會中的一員，我當然也會受香港文化影響。故我在寫研究報告時，經常提醒自己要有自我反省的意識，希望令本研究盡可能的客觀。

透過深入訪問和觀察，在解釋師奶定義發生改變的原因時，我希望強調當中人們的參與性和主動性，補充研究香港師奶課題所需的資料。在尋找有關香港師奶的研究資料時，我發現大多的研究都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去看。社會學學者比較著重以香港司法制度、教育政策、經濟模式等客觀環境的改變解釋師奶定義的改變。本研究希望從人類學的角度去看性別文化、身份和他者建構與師奶定義改變的關係，為日後有關香港師奶的研究提供更多方面的資料。

人類學強調人們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人們並非單純的、被動的受社會結構和文化影響。本研究強調香港人，特別是已婚女性在定義師奶時的主觀詮釋，這就是我所謂的人類學的角度去看。我認為經濟轉型和教育普及只是培養出師奶的基礎。在客觀環境改變的因素下，社會對女性的價值觀出現了一些小變化。在社會對女性的新舊價值觀交織的情況下，社會容許了一個有關師奶定義的協商空間。已婚女性就在這個討論空間中各自主觀地和主動地為師奶這個身份做出詮釋。由此可見，師奶的刻板化和負面化同時受著客觀條件和人們的主觀詮釋影響。

此外，本研究針對分析女性間的身份建構，希望帶出一種新的角度去看香港師奶負面化的問題：不能只看男性如何把女性建構為次等的他者而忽視女性間同樣的次等化。本研究指出已婚女性間存在一些畫界線的工作，不認為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透過刻劃自己與師奶之間的界線，把被刻板化的師奶排斥為及不上自己的他者。這種女性間的他者化希望能為讀者們帶來反思，從新的觀點去看師奶被負面化的原因。

另一方面，在做這個研究的過程中，我發現人們都會受社會的意識形態所影響。事實上，如何做一個好女人並沒有一個全球通行的答案。社會對女性的價值觀受各個不同地方的文化所影響。什麼好女人、師奶的意義都是社會各人同共建構出來的。認同或不認同自己是師奶的已婚女性對女性價值觀存在分歧，但她們同樣受意識形態建構的情況卻是一致的。只是她們所接收的並非完全相同的一套價值觀，故出現了有關師奶含義的可協商空間。

最後，我希望重申一次我做這個研究的目的：我希望大眾更了解社會文化和價值觀對自己的影響。本文的研究對象雖然只牽涉到一些已婚女性，但我仍然希望讀者們透過這個研究認識到別人如何被建構和被影響時，可從中認識到自己。

## 參考資料

- 吳開斌. 1997. 《香港話詞典》。廣州：花城出版社。
- 洗韻姬. 2004. 隱/現師奶：電視與日常生活的論述。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論文。
- 政府統計處. 2010. 《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免費下載版。政府統計處社會統計調查組。
- 香港討論區. 2010. “三不”女人宣言”。載  
<http://www.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action=printable&tid=11339715>,  
 於 2011 年 3 月 25 日登入。
- 香港電台. 2008. “電視節目資料庫”。載  
<http://app1.rthk.org.hk/php/tvarchivecatalog/episode.php?progid=566&tvcat=4>,  
 於 2011 年 2 月 1 日登入。
- 香港網絡大典. 2009. “師奶”。載  
<http://evchk.wikia.com/index.php?title=%E5%B8%AB%E5%A5%B6&action=history>,  
 於 2011 年 2 月 24 日登入。
- 高詠怡. 2006. 七十年代香港婦女雜誌中的「時代女性」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論文。
- 愛德華·W·薩義德著；王宇根譯. 1999. 《東方學》。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維基百科. 2010. “師奶”，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AB%E5%A5%B6>, 於 2011 年 2 月 24  
 日登入。
- 廖淑倫, 趙嘉, 廖生民編. 1948. 《廣州大觀》。廣州：天南出版社。
- 藍佩嘉. 2008.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
- 饒秉才, 歐陽覺亞, 周無忌編著. 2009. 《廣州話方言詞典》。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 Ho, Sik-ying Petula. 2009. “Desperate Housewives, The case of Chinese Si-Nais in Hong Kong.” *Affilia: Journal of Women and Social Work* 22(3): 255-270.
- Lamont, Michele and Marcel Fournier, eds. 1992. *Cultivating differences : symbolic boundaries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